学术专论

清代哥老会山堂考
——山堂组织的发展与等级结构的变迁

[韩] 尹恩子

[摘要] 清代哥老会以山堂为基础在各地发展组织。山堂是某个独立的哥老会组织的一种象征性称呼,哥老会模仿当时民间流行的梁山水浒故事而取山名、堂名。哥老会山堂的放票地区和成员规模由其骨干成员的活动范围和组织能力决定,其范围有的只限于一县的某个角落,有的则发展到不同省区的各州县,其会员总数也从数十到几万人不等。哥老会山堂的组织结构最初比较简单,发展到后来,其内部成员、山堂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复杂。以这些复杂而庞大的组织为基础,哥老会建立了广大而松散的人际关系网络。哥老会山堂的结构特点,成为其组织发展的基础与动力。

[关键词] 哥老会　山堂　等级结构　变迁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8587 (2010) - 01 - 0027 - 10

Organization Expansion and Changes of Hierarchy Structure of Ko-Lao Hui in the Qing Dynasty

Ko-Lao-Hui developed with Shan-Tang as organizational archetype in the Qing dynasty. Shan-Tang was a kind of symbolic code name for certain independent Ko-Lao Hui organization. Following the way in the popular story ‘Shui Hu Zhuan’ (The Outlaws of the Marsh), every organization used their particular names of both ‘Shan’ (mountain) and ‘Tang’ (hall). The territory and size of an organization depends on the radius of action as well as organizing capacity of its leaders. Some were limited to certain nook in a county with only dozens of members, while others spread into different counties in different provinces with members as much as tens of thousands.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Ko-Lao-Hui was simple at first, bu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inner members as well as outer organizations became very complex in later ages. Based on such complex and enormous organizations, Ko-Lao-Hui formed a huge but incompact relationship network. This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 had given Ko-Lao-Hui foundation and dynamic for its expansion.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哥老会山堂遍及全国各省。一个山堂意味着一个独立的哥老会组织。哥老会以山堂为基础在各地发展组织,形成广大的人际网络。哥老会“山堂”具有两种含义:一是以山名、堂名构成的某个哥老会组织的名称,二是指山堂的组织结构。那么,哥老会山堂的形成、特点与演变过程具体如何?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清代哥老会发展的背景与基本动力。但是,由于资料所限,关于清代哥老会山堂与其组织发展过程方面,以往的研究多缺乏具体的论述。因此,本文试图根据清代文献,进一步分析整理哥老会山堂的发展历史与特点。

清代哥老会文献涉及范围非常广泛,主要包括:档案史料及史料集、正史、实录、时人笔记与文集、地方志、报纸、杂志、内部文件

[收稿日期] 2009 - 06 - 22
[作者简介] 尹恩子 (1966—),女,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南京 210093

等。除此之外，民初出版的《中国秘密社会史》[1]、《教会源流考》[2]等出版物也包括在内。其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或由该馆出版的原始史料即“军机处录副奏折”[3]、《光绪朝硃批奏折》[4]以及《张之洞全集》[5]等，是本文使用材料的主要来源。

一、山堂的由来与发展

哥老会在成立组织的同时即指定山名、堂名，于是有了“开山立堂”之名。“山堂”是识别某一种秘密会党是否属于哥老会的最简单方式。[6]

“开立山堂”一般被认为是从啯噜转变到哥老会的标志之一。有关山堂的记录最早出现于张刘文的《上骆籲门制军平匪三策》里：“川中啯匪，游手少年，百十为群，夜聚昼散，始劫烟泥，继拉富室……兵勇千百，白昼插[歃]盟，某山某堂，公然牌识……昔之啯匪，犹在乡间，今之啯匪，全在营伍矣。”[7]据说这篇文章是咸丰十年（1860）骆秉章入川时，张刘文写给骆秉章的。[8]由此来看，咸丰末年四川啯噜已开始结盟拜会、开山立堂。另一方面，目前所知有关哥老会的最早记载，是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制定的湘军营规中“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9]这一条款。这两种记载表明，哥老会的出现与“开立山堂”的现象在时间上大体一致。

根据笔者调查，在早期哥老会文献中，有关山堂的记载不多。同治五年（1866）刘坤一《致李筱泉》中提到“忠义堂紫云山洪字号”[10]，这是笔者看到的最早的山堂记录。除了山名、堂名之外，哥老会还有香名、水名。同治十年（1871）刘提到“湖南会匪，随地放飘，分立山、堂、香、水名色”[11]，这是有关香、水的最早记录。由此来看，哥老会初期有山名、堂名，后来才有香名、水名。

那么，山、堂、香、水的含意是什么？一位匿名日本人说：“哥老会是模仿梁山泊而组织的，虽然现已不存在真的山寨，但是每一个团体必称山名、堂名，又有像把儒、道、佛混在一起的宗教仪式，每次有大事就在神前聚会，向神灵进献的香、水也是有起名的。”[12]对此，另一位日本人平山周也提到：“哥老会每团必设一某某山名，犹寺院之在某某山也。又有堂名，犹《水浒传》梁山上之有忠义堂。又有水名、香名，盖半为道教，半为佛教，又其半则出于宗教仪式以外。”[14]陶成章也说：“山取山寨之义，堂取同堂之义。”[15]概括而言，山名、堂名是模仿《水浒传》中的梁山故事而取名的，香名、水名则与其宗教仪式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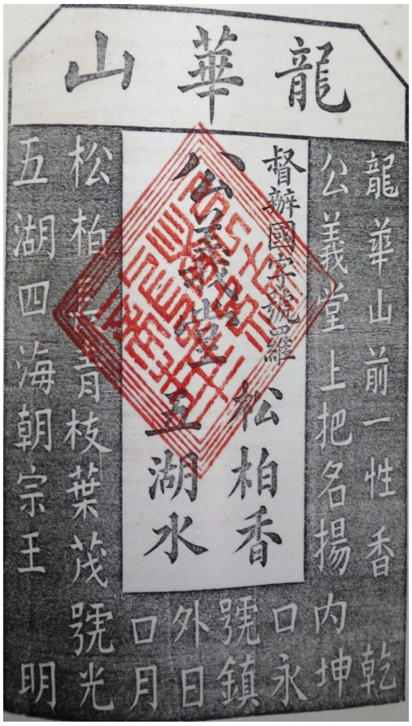

图 1 光绪十二年（1886）在上海发现的哥老会飘布[13]

清末各省哥老会的山堂分布情况如何？为了叙述的方便，笔者首先将清末行政区域划分为 24个省级区域[16]。除了山东、蒙古、黑龙江之外，在其余 21个省级区域都发现了哥老会的踪迹。而其中留下山堂名称的有 16个省级区域。表 1是这 16个省级区域的山堂分布情况。[17]

根据表 1，哥老会各省山堂数量最多的地区为湖南、安徽，其次是湖北、江西、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河南、直隶等地。哥老会山堂最集中的区域是长江中游各省，其余则分散在长江下游、华南地区。虽然表 1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各省哥老会的密集程度，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清代档案中关于西南地区尤其是四川哥老会的档案资料不多，关于山堂名称，几乎找不到任何具体记载，我们只能作一

表 1　晚清文献中各省哥老会山堂名称

发现省份	总数（个）	山堂名称
湖南	40	九台山乐善堂，九龙山大新堂，九龙山忠义堂太和水一品香，白虎山，金凤山名圣堂长清水松柏香，金硚山，金龙山，大名山，狼福山集贤堂，龙虎山忠义堂洞庭水太平香，万龙山公义堂，白虎山白鹤水古城香忠义堂，北梁山荆义堂，岳麓山，英雄山，五台山忠义堂长情香平安水，中明山太平堂，集英山同心堂，顺天山洗平堂仁义香来江水，天全山合义堂，天军山，天台山，天宝山玉华堂青龙水仁义香，忠义堂，忠义堂紫云山，太吉山，圣龙堂，回仑山，将军山兴隆堂朝阳水长远香，诸天堂，青龙山白虎堂，名青山四喜堂，飞雄山仁义堂西河水竭力香，飞龙山，龙华山公义堂长江水，九龙山，泰华山，锦华山，楚金山，中华凤凰山楚南洞庭堂
安徽	29	九华山公议堂，九华山天保堂，金华山结义堂，金台山，金龙山大胜堂，戴公山龙泉水金兰香结义堂，大兴山松柏堂，万荣山，万福山，天台山，名花堂五丑山鲁港水，文武山，福寿山仁义堂，紫寿山银河水集议堂盖世香，箭贤山，天官山地灵堂三山香五狱水，天宝山地灵堂五岳香四海水，楚岳山永乐堂郧阳香长江水，华盖山采右水九华堂，双龙山公义堂五湖香四海水，太平山，终南山，觉华山仁义堂，青龙山，九龙山，同兴九龙山英雄保国堂，九龙飞虎山八卦定君堂，万福双龙山忠义堂定海水三江香，天下西雷山福缘忠义堂三台镇江水五派富云香
湖北	20	九华山，大乾坤山，龙凤山，万福龙头山，万福山，木兰堂，蓬莱山，天台山，西华山公义堂，小乾坤山，松柏山长青堂三江水四海香，五龙山，天福金龙山，天顺山，楚金山，忠良山，宝华山，莲花山义顺堂甘露水普渡香，九龙山，飞龙福寿山
江西	20	昆仑山忠义堂，坤龙山至德堂，大金山，大西山，洞君山，武岳山洪福堂，富有山树义堂天下水万国香，岳麓山，卧龙山，爵华山仁义堂绿花水，临潼山忠义堂天下黄河水西岳华山香，天寿山三义堂一把香一心水，凤凰山忠义堂，国安仁义堂，回龙山，回仑山，汉家山三仙水名华香赵麒堂，莲华山忠义堂，九龙山，六龙山
浙江	18	文武山忠义堂，崇华山麒麟堂，五洋山三结堂，五太山忠义堂，王皇山，金凤山，青龙山，黑旗会，王笔山元胜堂，中华山报国堂，集贤山同心堂，双龙山公义堂，太雄山忠义堂，八宝山忠义堂，九龙山，终南山，飞虎山，万云山
江苏	16	白志山，九龙山，公论堂，大名山忠信堂，聚贤堂，天官山富贵堂三山香五岳水，天龙山五湖四海堂，楚金山护国堂，春宝山，双龙山，泰龙山聚兴堂，圣龙山明义堂，玉龙山，龙华山公义堂松柏香五湖水，东梁山，青龙山
福建	9	桃园会忠义堂，福凤山青龙堂，盛龙山明华堂，安凤山回龙堂，仰辉山，五凤山长青会，东南山，双龙山湘中水堂，双龙山忠义堂
广东	7	双龙山，来龙山，四方山，金龙山，青龙山，宝华山，天宝山
河南	6	九华山忠义堂五河水长寿香，九龙山仁义堂汉堂香长江水，浮龙山，东梁山，充巡山，太行山公义堂
直隶	5	精忠山报国堂，洪燕山，自杨山福来堂，春宝山忠义堂，宝华山
贵州	4	黔清山西胜堂，东南山西北堂，忠信山杰义堂，忠顶山积贤堂
广西	3	天台山，金龙山，天图山忠孝堂
陕西	2	英雄山少怀堂必成香长江水，集贤山聚星堂忠孝香会义水
甘肃	2	虎形山，西凉山
奉天	1	万化山英杰堂
四川	1	峨眉山

资料来源：本表资料主要依据《光绪朝硃批奏折》第 118、119辑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硃批奏折”中的秘密结社档案，并补充了档案史料集、时人文集、地方志等其他清代文献中的相关记载。

参考。

在清代文献中，关于每一个山堂规模的信息是有限的。笔者把其中能够确认放飘规模的资料收集起来制成表 2。按照哥老会会首与骨干成员的活动能力，每个山堂的放飘区域和成员规模不尽相同。有的只限于一个县的某一个角落，有的则发展到不同省区的各州县，会员总数也从数十到几万人不等。

清末，随着各地哥老会的扩散，其山堂形式影响到其他秘密社会组织。譬如：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前，湘南地区天地会、斋教活动频繁。而同治以后，天地会、教门活动逐渐减少，哥老会取代了这些传统组织的地位。与此同时，当地其他秘密社会组织开始接受哥老会的山堂形式。光绪二十年（1894），酃县会首邓世恩"自称粤逆洪秀全余党，创立天地会多年，邀伙入会甚众，并伪称两府天王"。而他却采用哥老会的开山立堂形式，命名为"九龙山、忠义堂、太和水、一品香"。在邓世恩起事时，充当先锋、军师的安仁县会首赵飞陇，"幼习粤匪洪教"，并自行"开立山堂"。[18]但是，这种情况只是发生于某些地区的个别组织当中。清代山堂形式主要还是存在于哥老会组织当中。

表 2　光绪年间各地哥老会山堂的放飘区域与成员规模

发现省份	发现时间（光绪）	会首名	山堂名	放飘区域	成员规模有关信息
湖南	五年	易泷泉	中华凤凰山楚南洞庭堂	石首、监利、华容	三千余人
	九年	刘幅元	九龙山大新堂	巴陵	五、六十人
	九年	杨松和尚		桃源	数千
	十一年	孟景明		道州	三百余人
	十五年	徐树堂		澧州	三百余人
	十八年	汪殿臣	天宝山玉华堂青龙水仁义香	巴陵、临湘	纠党千余人
	十八年	郭生云	英雄山堂	华容	散飘一百八人
	十八年	周迎椿	金凤山名圣堂长清水松柏香	华容	散飘二百余张
安徽	十六年	周子意		石埭、建德	数百人
	十七年	王霭亭	紫寿山银河水集议堂盖世香	宣城、建平、青阳	八千余人
	十七年	何老小	华盖山采石水九华堂	芜湖	七、八十人
	二十四年	曾老大	九龙飞虎山八卦定君堂	宁国、泾县	一百三十余人
	二十五年	骆海清	万荣山、万福山、天台山	大平、宁国等府	放飘二百余张
	二十七年	田化陇		广德州	二、三千人
湖北	十六年	李典	玉龙山、金象山、飞虎山、莲花山	自荆州起至九江安庆	放飘六万余张
	十八年	陈大才	万福龙头山	汉川	散飘八十余张
广东	十二年	吕玉成	双龙山	肇庆府	一万以上
	十二年	李世溃	天宝山地灵堂五岳香四海水	肇庆府、南京	一万几千人
陕西	十四年	张铁梅		湖北、吉林、山西、陕西等省各州县	散飘七百余张
	二十六年	方大奇		西安府	一百二十余人
	二十八年	拜霖	集贤山聚星堂忠孝香会义水	渭南	四十余人
浙江	二十年	胡名扬	王笔山元胜堂，中华山报国堂，另有十余堂	安吉	散飘一千余张
江西	二十一年	胡坚卧		萍乡	散票三百余张
广西	二十年	蒋海标	天台金龙山	永安州	三百余人
甘肃	二十三年	刘二		安化、合水	千余人
江苏	三十二年	易翰	天龙山堂	南京、浙江定海、嘉兴	放飘三百七十余张

资料来源：同表 1。

二、山堂名称的含义

清代文献中哥老会的山堂名称并不是都记录着“山、堂、香、水”的全名。根据表 1，其中出现最多的是“××山、××堂”这一形式。然后依次是“××山”，“××山、××堂、××香、××水”，“××山、××堂、××水”，“××堂”等形式。后期又出现了“××××山、××××堂”或“××××山、××××堂、××××香、××××水”的形式，显得更为复杂。那么，各地哥老会组织是否并不都是采用山、堂、香、水之名？对此，笔者还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

哥老会这些山堂名称有什么含义呢？仔细分析表 1，我们能发现当时比较流行的一些山名和堂名。笔者对其中重复出现的山、堂、香、水名称做了统计，详见表 3。

表 3　清代哥老会山、堂、香、水名称用词频度统计

词汇	忠义	九龙	仁义	双龙，青龙，公义	九华	万福，四海	白虎，集贤，英雄
次数	20	11	8	7	6	4	3

资料来源：表 1。

由表 3可见，“忠义堂”作为堂名使用最多，达 20次。“九龙山”山名总共出现 11次。除此之外，仁义、双龙、青龙、公义、九华也属于出现较多的词汇。忠义堂原名“聚义厅”，它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们的聚集场所。因此，作为江湖好汉聚集场所之意，清代秘密社会组织常常把忠义堂用于自己的组织名称之中，哥老会也不例外。“九龙山”这一名称，则与光绪二年（1876）在全国发生的“剪辫、妖术”事件有关。“剪辫、妖术”事件也称“九龙山事件”，是由哥老会与姚门教、天水教等秘密宗教组织制造的一场闹剧。[19]他们散布谣言说“九龙山纸人祭活之后，须配生人头发方能打仗”[20]、“收取人发、鸡毛，练成阴兵、神马，约期起事”[21]。九龙山的具体位置，当时有人说在福建，有人说在广东。最终这场风波被官方平息。而一些哥老会成员继续宣传“凡入会之人，俟福建九龙山竖旗起事，一同接应”[22]、“九龙山不久即须起事……入太平山哥老会，可免杀戮”[23]等谣言，并劝人加入组织。这样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传播方式，使九龙山似乎成为了哥老会的叛乱圣地。光绪年间，九龙山山名一直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流行。

另外，在哥老会山、堂、香、水名称中，龙、义、忠是最常见的字眼。其他比较常见的还有华、天、九、金、五、福、公等带有吉祥色彩的字眼。笔者对表 1当中出现频度较多的单一字眼也做了统计，详见表 4。

表 4　清代哥老会山、堂、香、水名称中重复出现的单一字眼统计

字	龙	义	忠	华	天	九金	五	福	公青	凤	江仁台宝	三虎西大万	贤四	雄英集白
次数	53	45	27	26	23	17	14	12	10	9	8	7	6	5

资料来源：表 1。

山堂名称一般是由首领来决定的。那么，这些字眼暗示着什么？在中国，“龙”象征着“皇帝”或“皇权”，它显示了哥老会首领对政治权力的向往。哥老会会内称王、封爵现象，同样体现了这种倾向。即使这种追求很少能够真正实现，他们还是希望能够由此抬高首领本人和山堂的权威。“义”在江湖上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之意。“义”是江湖游民互相帮助、谋求生存的道德。“义”是联结哥老会成员的纽带，它能把会众的力量凝聚在一起。[24]因此，哥老会从上而下把“义”作为最高道德观念。在传统时代，“忠”意味着“忠君”或是“反清复明”[25]。但是，这些话题对于下层贫困群体来说未免有些不切实际。[26]在哥老会当中，“忠”可能发挥着对组织和会首的忠诚、不泄漏组织和兄弟的秘密等作用。总而言之，哥老会山堂名称包含着哥老会首领的皇权思想与组织成员的共同理念和追求。

三、山堂内部的等级结构

虽然秘密会党崇尚义气，“不分尊卑年齿，兄弟称呼”[27]，但他们的“平等”是一种

等级体制之下的平等，“各有位次”，这与现代平等观念有所不同。[28]

哥老会继承了清中期以来在四川、贵州一带蔓延的异性结拜组织特征。尤其是啯噜的等级称呼，再度出现于哥老会内部，如第一会首名称老帽、帽顶，其他等级称老五、大五、老幺、老满、大满、小满、幺满等。而哥老会作为一种会党组织，则将其发展成更加复杂而系统的等级结构。

关于哥老会首领，“其渠不以齿序，以能结人之多而为群丑所服者为首，名之曰老帽”。[29]清末哥老会会首的名称在时空上有些差异，主要有坐堂、老帽、帽顶、龙头（或正龙头）、大哥等。（1）“坐堂”或“坐堂老帽”，这是同治年间哥老会首领的主要称呼之一，到了19世纪80年代后期，坐堂逐渐退到第2、3等地位；（2）“老帽（或老冒）”，道光二年（1821）作为啯噜头目称呼早有记录，[30]同治初年至光绪前半期，它作为哥老会首领名称广泛使用；从地区来看，这一称呼在湖南尤为流行，在贵州、四川、福建、江苏、安徽、新疆等地也有使用；（3）“帽顶（或冒顶）”，在嘉庆年间已有记载，[31]清末作为哥老会会首名称，一直到20世纪初仍在四川广泛使用，在贵州、湖南、陕西地区也有实例；（4）就笔者所见，“龙头”名称最早于光绪十三年（1887）出现在安徽、福建一带，[32]此后，“正龙头”这一称呼在长江中下游、华南、河南各地广泛使用。

除此之外，在清代文献中，哥老会会首的名称还有很多种，如冒壳子大爷、总堂、坐堂老帽、总堂老冒、总冒顶（以上见于湖南），坐堂老大、龙头大爷（湖北），龙头坐堂（湖北、安徽），龙头总老帽（福建），等等。

清代哥老会山堂内部有八个基本等级，即八牌，分成上四牌、下四牌。同治年间，李榕记载：“每堂八牌，以一、二、三、五为上四牌，六、八、九、十为下四牌，以四、七两字为避忌，不立此牌。”[33]在相关文献中，“上、下四牌（或排）”又称“上、下四等”。

表5 同治年间各地哥老会等级结构

地区	时间	上四牌		下四牌
		第一等级（老帽）	二爷、三爷、五爷	六、八、九、十
湖北	同治七年（1868）	大老帽，老帽、陪堂	红旗	
福建	同治七年	坐堂（总老冒），行堂（老冒）		
湖南	同治七年	坐堂老帽，行堂老帽	圣贤二爷，当家三爷，红旗五爷，黑旗五爷	管班、探水、武生、武旦、红净、黑净
湖南	同治十年（1871）	老冒，冒壳子大爷	圣贤二爷、当家三爷、红旗五爷	老幺
湖南	同治十三年（1874）	总堂，坐堂、行堂	当家、理事	

资料来源：“军机处录副奏折”，补169胶片564-6，同治七年五月六日，署理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臣郭柏荫等；《闽浙总督英桂等为报福建哥老会与游勇结会事奏折》，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载《历史档案》1998年第4期，第37页；（清）李榕：《禀曾中堂李制军彭宫保刘中丞》，《十三峰书屋》批牍卷1，迪毅书社（成都），1922年，第18页；（清）天下第一伤心人：《哥老会说》，《辟邪纪实》附一卷，同治辛未年，第13页；《湘乡县志》卷5《兵防》，同治十三年，第44页。

根据表5，在同治年间，哥老会第一等级有坐堂（或老帽、坐堂老帽）、行堂（或行堂老帽）、陪堂三种名目，其下有圣贤二爷、当家三爷、红旗五爷、黑旗五爷。其中，上四牌包括第一等级头目和其下之二、三、五爷。关于下四牌，早期文献中没有发现典型的例子。上四牌的职责分别是：老帽、坐堂为山主，行堂、陪堂相当于副山主，圣贤为主持谋议者，当家为管理财物，红旗为传话派人，黑旗为抓人执法。[34]在发展组织方面，第一等级可以另开自己的山堂，上四牌的人可以放飘招人。

到了光绪年间，哥老会等级称呼出现了变

化，而且名目剧增。尤其是到了 19世纪 80年代，其变化更为明显。首先，第一等级名目已增加到 8～10个，并称老大、大爷、大哥；其次，作为最高首领的名称，正龙头开始广泛使用；第三，下四牌名目也有所增加。笔者把光绪、宣统年间各地哥老会（袍哥）等级结构情况制作成表 6。从表 6来看，各地组织虽然在等级称呼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其结构体系基本上是一致的。

表 6　光绪、宣统年间各地哥老会（袍哥）等级结构（1）

地区	时间	上四牌	下四牌	
		第一等级（老大、大爷、大哥）	老二、三、五	老六、八、九、幺（幺）
广东	光绪十二年（1886）	大哥、次之总坐、香长、护印、坐堂、护剑、陪堂、明堂、礼堂、管堂、执堂、行堂、新副	军师、皇侯、红旗	巡风、大八、大九、大满、小满
安徽	光绪十三年（1887）	龙头、坐堂、培堂、刑堂、礼堂、执堂、新副、盟证、香长、	对贤、当家、桓侯、红旗、黑旗	巡风、花管、大满、小满、幺满
	光绪十七年（1891）	龙头坐堂、陪堂、礼堂、刑堂、值堂、盟證、香长、心腹	文圣贤、武圣贤、桓侯当家、披红当家、插花当家	青缸、花冠、县牌、江口、铜章、铁印
长江沿岸码头	光绪十七年	龙头、坐堂、陪堂、香长、盟证、新副	圣贤、当家、红旗	老六、老八、老九、老么
豫皖边界	光绪十八年（1892）	正龙头、副龙头、坐堂、陪堂、礼堂、刑堂、智堂、护印、香长、心腹	圣贤老二、王侯老三、红旗老五	巡风老六、顺八老八、尖口老九、铜掌老么
四川	宣统元年（1909）	大爷（坐堂大爷）	二爷、三爷、老五（五牌）（红、黑旗管事）	老六、老八、老九、老幺（幺牌）
浙江	宣统二年（1910）	督理（正龙头）、总理（副龙头）、五堂（将帅：公·侯·伯·子·男）	圣贤老二、新副老三、红旗老五	蓝旗老六、巡风老八、老九（大九·小九）、大麼、小麼、大么、小么、七牌、八牌

资料来源：《湘粤剿灭哥老会文稿》，《近代史资料》总第 67号，1987年，第 76页；“军机处录副奏折”，补 170胶片 568-4，光绪十三年五月初十日，安徽巡抚陈彝；《光绪朝硃批奏折》，第 118辑，第 320页，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安徽巡抚沈秉成；张之洞：《札各属严密防范会匪（附单）》，光绪十七年十月初五日，《张之洞全集》公牍，第 4册，第 2925页；《光绪朝硃批奏折》，第 118辑，第 499页，光绪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安徽巡抚沈秉成；（清）傅崇矩撰：《成都通览》（下），巴蜀书社，1987年，第 47—48页；陶成章：《教会源流考》，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3），第 110页。

另外，哥老会的等级结构后来又出现了另一种区分方式，即内八堂、外八堂。也就是说，第一等级的“八个堂首名目”叫做“内八堂”，之下则称“外八堂”。在清代文献中，内、外八堂的出现时间并不清楚。目前所知的是，内、外八堂的区分起因于第一等级名目的增加。由此推断，内、外八堂之区别大约开始于 19世纪 80年代。

表 7　光绪、宣统年间哥老会等级结构（2）

地区	时间	内八堂	外八堂
		第一等级（老大、大爷、大哥）	第二、三、五、六、八、九、十等级
两湖	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后	正龙头、副龙头、坐堂、盟证、陪堂、理堂、刑堂、执堂、香长	心腹、圣贤、堂家、红旗、巡风、大九、小九、总幺满、大幺、小幺、大满、小满
华南	光绪二十九年（1903）	正龙头、坐堂（宰相）、陪堂（财务官）、名堂（外交官）、礼堂（学务官）、刑堂（司法官）、盟证（司誓官）、香长（拈香官）	心腹大爷（大将军）、圣贤二爷（文事秘书官）、当家三爷（会计）、管事五爷（常务）、尖口六爷（同）、巡风八爷（同）、大满九爷（同）、幺满十爷（同）

资料来源：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 83、84页；まこと生：前揭文，第 19页。

有关内、外八堂方面，まこと生留下了有趣的记录："内八堂以首领的心腹部下组成，绝不允许外来人加入。但是外八堂则西洋人、日本人谁都能参加，豪杰之士大可一试。"[35]这显示内八堂在哥老会组织内部处于一种特殊地位，它是哥老会上层领导核心，决定本山堂的重要事情，如开堂放票、处决违规者等。外八堂在会中属于中层领导，并负责处理会内具体事务。[36]

四、哥老会骨干成员与山堂之间的关系

哥老会山堂是某个独立组织的一种象征性称呼，不是一种实体概念。对哥老会会首来说，指定一个山堂名称只不过是一种用以发展组织的手段而已。因此，在清代文献中，一名哥老会会首指定某山堂名称，这种事情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而且有的会首在各地开设不同名称的山堂。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哥老会会首一身而拥有几个甚至十余个山堂。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肇庆府拿获首领李世濆（湖南湘乡县人），他供认："现充哥老会中来龙、四方、金龙、青龙、宝华、天宝等山总首领，即是开山头人，已经五、六年会党。"[37]光绪二十年（1894），胡名扬在浙江安吉县被捕，他有长期充当会首的经历，并开设了十余个山堂。他承认自己是"湖南湘乡县人，年六十一岁，咸丰年间投营当勇，斥革后投入哥老会，名王笔山元胜堂，会中称伊为行堂大头目。伊又开设中华山报国堂，另有十余堂"。[38]这类拥有多个山堂的首领，其活动范围常常涉及到几个省份。例如，光绪三十年（1904）在陕西被捕的会首黄祺（湖南长沙县人）供认："光绪二十二年，在甘肃西宁县地方入哥老会……历在甘肃、陕西、河南等省开立山堂八处。"[39]

除此之外，哥老会骨干成员与山堂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复杂。首先，清代哥老会山堂内部有八个基本等级。其中，属于第一等级的职衔在光绪年间最多有八到十个名目，另称"内八堂"。他们是可以自己另开山堂的。再者，单个哥老会山堂组织的最高领导正龙头、副龙头一般各由一人担任，而下属的每一个等级，则可以由好几个人同时担任，并使用不同字号来互相区别，比如坐堂"英"字号、坐堂"雄"字号等等。[40]因此，山堂之间形成了非常错综复杂的组织网络关系。

第二，哥老会成员自由选择加入不同山堂。一名哥老会成员同时加入好几个山堂，并在不同山堂里拥有不同职衔，这种情况也不少。光绪十八年（1892），湖北汉水流域沿岸钟祥县拿获哥老会成员李泽湘，他供认"系钟祥县人，入会五次，先后堂名不一，得受伪职，放飘纠夥六十余人，亲钞海底簿，熟习口号"。[41]当时被称为"长江三龙"之一的王金龙供认："为龙华山巡风，又为玉龙山心腹。"[42]同年，湖南长沙县人金剩即金钰堂，先在安徽省南陵县充当捕役，"误公斥革，即入熊登旺金台山会，列为老六，升作老五，又入吴有楚福寿山会，列为老三"。[43]

第三，在特殊情况之下，山堂之间携手形成一个联合组织，其时便在单一山堂组织内设立好几名正龙头、副龙头。江西洪江会会首马福益"与逸匪王春和、李柏云、刘正鼇四人，同升为正龙头"。[44]光绪二十六年（1900），自立会联络长江中下游会党，设富有山堂，入会者达十余万人，富有山堂内部正、副龙头各有十三人。[45]

哥老会以其复杂的组织网络为基础，其成员和山堂之间建立了庞大而松散的人际网络关系。这种等级结构上的特点，成为清代哥老会组织发展的基本背景与动力。

结　语

哥老会模仿当时民间流行的水浒梁山故事而取山名、堂名，后来与宗教仪式有关再取香名、水名。因此，哥老会有了"山、堂、香、水"的取名形式。山堂名称包含着山堂的权威、会首的皇权意识，同时显示了组织成员的共同理念和追求。清代哥老会山堂组织发展的社会基础是日渐增加的游民群体。而哥老会山堂的放飘地区和成员规模是由其骨干成员的活动范围和组织能力决定的，有的只限于一个县的某一个角落，有的则发展到不同省区的各州

县，其会员总数也相差很大，从数十到几万人不等。

哥老会山堂的组织结构呈现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它以啯噜组织形态为基础，逐渐发展成更加复杂而系统的等级结构。虽然哥老会的等级结构和具体名称在时空上存在着一些差别，但其基本结构还是一致的：它有八个基本等级，分为“上、下四牌”，后来又出现“内、外八堂”的区分方式，其中“内八堂”属于组织领导核心，主导了各地山堂组织的诞生与发展。哥老会成员内部、山堂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复杂，一个会首可能同时发展好几个山堂，“内八堂”成员可能不受单个山堂的约束而按照个人能力自由发展组织，在一个山堂里可能有好几个人同时担任一个职务，有的成员在不同山堂里同时拥有不同职务，在特殊情况下几个山堂还可能形成一个联合体。以这些复杂而庞大的组织为基础，哥老会建立了广大而松散的人际关系网络。哥老会山堂的组织特点，成为其组织发展的基础与动力。

---

①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12年。1897年平山周和宫崎滔天受日本外务省委派赴中国调查秘密会党，1912年出版了该书。

②陶成章：《教会源流考》，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3），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罗尔纲说，“教会源流考，原书于民国纪元前二年，由章太炎等合组教育今语杂识社（东京——笔者注）印行”。见《天地会文献录》，正中书局，1947年（1943年初版），第75页。该书1916年在中国正式出版。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以下简称“军机处录副奏折”）。

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全120册），中华书局，1995年。

⑤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全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⑥比如，天地会只有堂名，不立山名。“早期天地会一般是没有堂名，天地会有堂名，始于道光年间广西天地会”（吴善中：《晚清哥老会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8页）。

⑦张刘文：《上骆籲门制军平匪三策》，《秉唐遗稿》文集卷2，光绪四年，第7页。

⑧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4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2518页。

⑨曾国藩：《禁洋烟等事之规七条》，《曾国藩全集》诗文、营规，第14册，岳麓书社，1994年，第466页。

⑩刘坤一：《致李筱泉》，同治五年四月初四日，《刘忠诚公（坤一）遗集》书牍卷3，第42页。

⑪刘崐：《扑灭益阳龙阳会匪並跟踪搜剿折》，同治十年三月，《刘中丞（韫斋）奏稿》卷8，第24页。

⑫まこと生：《哥老会》，《黑龙》第14期，1903年，第18页。

⑬Playfair, G. M. H.,“The Kolao Secret Society”, *China Review* (Hong Kong) 15, 1886, p. 129.

⑭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80页。

⑮陶成章：《教会源流考》，《辛亥革命》（3），第110页。

⑯24个省级区域为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新疆、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蒙古、台湾。

⑰哥老会首领开设山堂的地区和发生案件的地方不一定一致。表1根据发现和被捕地区来进行整理。

⑱《光绪朝硃批奏折》，第118辑，第604页，光绪二十年，江西巡抚德馨。

⑲参见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吴善中：《清光绪二年“妖术”恐慌述论》，《江海学刊》2004年第2期。

⑳《署闽浙总督文煜等为报漳州九龙山并无会党活动事片》，光绪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历史档案》1998年第3期，第51页。

㉑《江西巡抚刘秉璋为报查获会党活动各犯审明办理事片》，光绪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历史档案》1998年第3期，第49页。

㉒《光绪朝硃批奏折》，第118辑，第514页，光绪十八年九月十四日，湖广总督张之洞。

㉓《光绪朝硃批奏折》，第118辑，第277页，光绪十五年三月至十二月，安徽巡抚沈秉成。

㉔关于江湖文化当中的“义”之含义，参见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271—286页。

㉕有关秘密会党的忠义思想，参见刘平：《秘密会党的忠义思想批判》，《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2期。

㉖与此相关，有学者认为“所谓会党的‘反清复明’宗旨，既不是为了‘复明’，也不是为了‘复汉’，只不过是底层民众通过造反谋求狭隘的小团体利益，甚至个人利益的幌子而已”（李恭忠：《评〈文化与叛乱〉》，《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72页）。

㉗《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9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4年，第868页，光绪三十年八月初二日，河

南巡抚陈夔龙。
㉘有关游民、秘密会党的平等思想，参见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第 286—294 页；周育民：《秘密会党与民族主义——评杜赞奇对清末革命党会党观的论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 1期，第 122页。
㉙（清）李勖修：《来凤县志》“风俗志·民风”，同治五年，第 4页。
㉚《三省边防备览·策略》，道光二年，蒋维明编：《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资料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 21页。
㉛“川省五方杂处，匪徒最易溷跡……号称大五、小五、帽顶”，见《嘉庆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巴县团首牌甲条例》，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 279页。“帽顶”有时指组织名：“川省匪徒日众，联名结社，有帽顶会、灯花教诸名目”。《穆宗毅皇帝实录》，同治十三年五月壬戌，《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 852页。
㉜“军机处录副奏折”，补 170胶片 574-1，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日，杨昌浚奏；补 170胶片 568-4，光绪十三年五月初十日，安徽巡抚陈彝。
㉝㉞（清）李榕：《禀曾中堂李制军彭宫保刘中丞》，《十三峰书屋》批牍卷 1，迪毅书社（成都），1922年，第 18页。
㉟まこと生：前揭文，第 18、19页。
㊱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 52—54页。
㊲“军机处录副奏折”，124胶片 2727-47，光绪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张之洞片。
㊳《光绪朝硃批奏折》，第 118辑，第 595页，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二日，护理浙江巡抚调补河南布政使刘树堂。
㊴《光绪朝硃批奏折》，第 119辑，第 3页，光绪三十年五月二日，头品顶戴署、理江西巡抚、陕西布政使夏旹。
㊵《湘粤剿灭哥老会文稿》，《近代史资料》总第 67号，1987年，第 77页。
㊶《光绪朝硃批奏折》，第 118辑，第 514页，光绪十八年九月十四日，湖广总督张之洞。
㊷《光绪朝硃批奏折》，第 118辑，第 497页，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等。
㊸《光绪朝硃批奏折》，第 118辑，第 458页，光绪十八年四月初四日，安徽巡抚沈秉成。
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硃批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57胶片 706-5，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护理江西巡抚布政使沈瑜庆。
㊺俞廉三：《岳州镇呈报匪情咨》，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一日，载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资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第 128页。

（上接第 26页）
㉓㉔杨曾文校写《六祖坛经》（新版、敦煌新本）附编（一）《曹溪大师传》页 127，页 154。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
㉕元德异刊行、丁福保笺注《六祖坛经笺注》《付嘱品第十》（《德惠丛书》3，1992年 5月学道者重刊再版）页 269则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兴化，建立吾宗，缔缉伽蓝，昌隆法嗣……”。
㉖杨讷编《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页 153，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㉗周克复《净土晨钟》页 147，《卍续藏经》10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复印。
㉘《金不换》卷三《论大考月调》，页 514。
㉙《金不换》卷四《再叹考场》，页 545。
㉚《金不换》卷六《投案呈词》，页 700—701。
㉛颜元《存人编》《第五唤》页 182，收入氏著《习斋四存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㉜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页 110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㉞嘉庆十一年八月初四日批《护理江西巡抚先福奏审拟吴文春折》附一：吴文春供单，附二：吴文春所藏符箓，人大清史所、一档馆编《天地会》（六）页 283—2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
㉟《天地会》（六）五江西天地会吴之春等结会时所藏符箓。按“吴之春”乃“吴文春”之误。
㊱嘉庆十一年八月初五日《大学士董诰奏议复阿林保等审拟杜世明一案折》（军录），《天地会》（六）页 286—287。
㊲嘉庆十九年九月十八日批《闽浙总督汪志伊奏审拟张显鲁等结仁义会折》（军录），《天地会》（六）页 186。
㊳嘉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批《闽浙总督汪志伊奏审明熊毛等结仁义会折》（军录），《天地会》（六）页 193—194。